

“中国之路”(1949~2009)* (上)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

一、关于中国发展前景的国际争论

中国之路这个命题,实际上西方人提得比较多;中国学者其实提到的还并不是太多。国际上对中国发展前景始终有不同的争论、推测、看法。

费正清的“伟大建设论”(1987)。他从历史角度透视,预言:“我们看到邓小平的改革取得的重大进步,不禁回忆起历朝奠基者的事业,都在他们的后代第二号大人物手中得到巩固——例如唐太宗皇帝,宋太宗皇帝,明朝的永乐,清朝的康熙(大帝)。每一个朝代,开国者的不可缺少的成功,后面接着都有一个伟大的建设时期。”^[1]

尼克松的“巨人苏醒论”(1988)。他认为,邓小平的改革把世界1/5人口的巨大潜力发挥出来。如果中国继续走邓小平的道路,我们孙辈们的世界不再是两个,而将有三个超级大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还引述了拿破仑的话,中国这个酣睡的巨人现在苏醒了,她的时候到来了,她准备震动世界。^[2]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兴盛论”(1989)。如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认为,2000年前,中国会超过英国和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的总数,到2000年将大大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大国。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预言。^[3]保罗·肯尼迪认为,唯一可能阻止中国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的事情也许是发生同苏联的战争或者“文化大革命”式的长期政治动乱。^[4]

布热津斯基的“中国的明治维新论”(1989)。^[5]他在《大失败》一书中认为,在今后的数十年中,一个更加现代化、更加强大的中国可能会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目前正在推行的这项改革计划将会变成中国的明治维新,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才迅速地进入现代世界的行列之中。他认为,只要不发生无法预测的自然灾害或政治动乱,中国很可能在下一个十年中持续高速地向前发展。

奥弗霍尔特的“中国崛起论”(1994)。^[6]在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中国,西方媒体一致性的唱衰中国,而奥弗霍尔特反其道行之,根据他的研究提出了“中国崛起论”。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成

※本文系作者2010年1月9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第二期论文博士班上的讲课录音稿,由马伟同学协助整理,梁佼晨校对;2010年10月8日稿。

[1]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Harper Perennial(September 9,1987);中文版,刘尊棋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7。

[2]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99:不战而胜》(1999:Victory Without War), Simon&Schuster(January 1,1988);中文版,朱佳穗、庄汉隆译,北京:长征出版社,1989。

[3] 胡鞍钢:《中国:走向21世纪》,119页,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

[4]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Vintage,(January 15,1989);中文版,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

[5]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llier Books,(March 1990);中文版,北京:军事科技出版社,1989年。

[6] 威廉·奥弗霍尔特(William H.Overholt):《中国的崛起:经济改革正在如何造就一个新的超级强国》(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W.W.Norton&Company(October 17,1994);中文版,杨达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功如此的引人注目,是同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欧洲国家(指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上的失败对比的结果。许多西方人,首先是美国人,为东欧和西欧推翻共产主义政权而感到激动,而对“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专制政权居然保留下来而感到厌恶。然而,他发现,生活在中国的人民却感到庆幸。他认为,中国的经验表明,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实可以走向市场制度。他告诉西方读者,中国的崛起正在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改革的成功,无疑是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且无疑会是促进地区性稳定和世界稳定的积极因素。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威胁论”、“唱衰中国论”及21世纪开始出现的“中国经济崩溃论”。1995年,美国学者布朗发表《谁来养活中国》一书,宣扬中国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将影响世界经济,中国不可能养活自己,大量进口粮食,引起世界粮食价格前所未有地上涨,极大地威胁整个世界。^[7]2001年7月,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溃》一书。^[8]他引用了我很多研究成果,^[9]但是我和他的结论却是不同的。他还引用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名句,大胆地称:对于下一场星星之火可能会造成的火灾,历史将记得,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他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五年”。2002年3月,美国《中国经济》季刊主编斯塔德维尔在《中国梦》一书中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他预言中国将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并警告投资者“不要轻易把亿万美元的投资扔进中国这个无底洞”。^[10]

雷默的“北京共识论”。美国高盛公司顾问、曾任《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的雷默在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2002年,我参与了前美国高盛公司CEO桑顿在经济管理学院开设《全球领导力》的课程,并且也讲了我的观点,比如绿猫论等。雷默当时曾给他做助手,特别聪明地写出来《北京共识》,其中引用我的一些观点,特别是他比较赞赏中国之路实际上是创新之路。^[11]本来应该是我们中国学者写出类似的观点和文章,但是我们并没有。在雷默写完《北京共识》之后,黄平、崔之元和我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由于我比较忌讳“模式”,我还是强调“中国之路”,所以我在2006年写了一篇对中国之路初步认识的文章。后来收录在黄平、崔之元主编的《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一书中。^[12]

“中美共治论”。这是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腾提出来的,简称“G2论”。他的主要理由是在当今世界没有美中两国的合作将一事无成。无论是多边贸易谈判、气候框架协议还是通货体制的重建,无不如此。只有美中两国首次达成原则协议,缩小相互间的差距,才有可能达成国际协定。他所说的“G2论”是指为达成协议而提供一个非正式的平台,而不是要用它来取代G8、G20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无论美中两国是否在经济领域进行合作,都不能改变它们占有世界经济主体地位的事实,而合作则有助于提高效率。他承认,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结果,即美国的信誉下降,中国的地位上升。这种倾向并不是新现象,但危机加速了变化速度,美中的实力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13]

中国统治论。最近,马丁出版了《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14]提出一个所谓的“中国统治论”和前面“中美共治

[7] Lester R. Brown, 1995, Who Will Feed China? : Wake-Up Call for a Small Planet, W.W. Norton & Company, Inc.

[8] Gordon G. Chang, 2001,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9] 书中引用了我对失业、国企以及腐败等相关研究和数据。Gordon G. Chang, 2001,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pp. 66, 185.

[10] Joe Studwell, 2002, The China Dream: The Quest for the Last Great Untapped Market on Earth,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st edition (March).

[11] 2004年5月,清华大学教授雷默用英文发表了 Beijing Consensus 一文,引发国内外热烈讨论,反响很强烈。2005年,黄平、崔之元收集了国内外这方面一些很有影响力的论文,并于2005年8月专门召开“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研讨会,对这一问题作纵深探讨,并出版了《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一书。

[12] 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3] 《G2论创始人主张用多国框架结构消解美中摩擦》,《日本经济新闻》,2010年6月6日。

[14] Martin Jacques, 2009,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llen Lane Press, June, 2009; 中文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论”差不多。他在该书的第一部分《西方世界的终结》中指出,在这个世界中,她(指中国)日益享有一种霸权地位,在仅仅10年内,她的触角就会延伸到东亚、中亚、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地……鉴于中国有希望变得非常强大和不同,所以一个难于抵制的想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崛起将预示着一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他认为,中国绝对不会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会选择一种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的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他预测,中国将成为全球文化霸主。中国的崛起将改变全球,世界将由西方塑造走向更多的中国塑造。

中国领导责任论。2010年5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向美国国会提交《国家安全战略报告》,^[15]提出了“重振美国和领导世界”战略。同时也提出,美国对中国的新定位,该战略文件首次呼吁中国要肩负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Responsible Leadership Role),“国际组织必须能更有效地代表21世纪的世界,让新兴国家发出更广泛的声音,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意味着美国正式放弃长期以来的“单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这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定位,从早期的“敌人”、“竞争者”到近年来的“利益攸关方”、“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和“负责任的大国”等,其目的还是要“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16]

“中国第四次崛起论”。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2009年3月25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王赓武教授的题为:《中国再度崛起》,称“中国正迎来两千年历史中的第四次崛起,但如何驾驭这次崛起将给中国领导人带来比前三次崛起更大的挑战”。文章指出,陆地上的关系影响了中国头三次崛起: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世纪帝国统一后;第二次是在公元七八世纪期间,突厥帝国对中亚贸易路线的威胁促成短暂巩固;第三次是依靠清王朝的军事实力达到鼎盛。只有这最近一次崛起才是受到经济推动,并面临全球挑战,中国有史以来首次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他称,西方希望中国继续前进,符合他们认为的全球未来理想。但中国的自我意识促使她质疑西方这些要求的合理性。中国领导人更愿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速度行事。他认为,中国优先考虑的事务很可能如下:继续把全球经济视为通往更远大目标的途径,使之服务于首要目标: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在世界上享有尊重和影响力;接受保持文明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将现代思想与本国遗产的精华相融合。但长远而言,中国领导人将继续着眼于中国理念的中心:一个统一国家及和谐社会的安定,而只有良好施政才能确保这些。在全球化潜在的不确定环境中,各种利益和势力你争我夺,取得这一目标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17]

不过,探讨中国模式形成新的国际学术热点和争论点,其背景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遇到了巨大挑战。早在20年前冷战结束时,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18]乐观地相信历史以自由民主最终战胜了共产主义专制而“终结”。德国外交政策协会奥拓·沃尔夫研究所所长桑德施耐德认为,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命题并没有兑现,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反而陷入惊恐和忧虑。今天,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极大地打击了西方民主国家的信心,像中国这样的非民主国家已经上升为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大国。中国在保持了威权独裁体制的同时,的确从贫穷的不发达国家转变成实现了一定富裕程度的社会。以中国为代表的那些“成功的威权体制”,对西方民主制度确实带来挑战。他认为,以西方为中心和出发点来为其他国家制定民主化的规范和价值标准,是过于简单的做法,是一厢情愿。^[19]

意大利经济学家乔万尼·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20]分析了毁灭性的资本主义,他认

[15]中文版见新华社:《参考资料》,第107~109期,2010年6月8日、9日、10日。

[16]郑永年:《美国的中国新定位及其对中国的挑战》,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6月1日。

[17]Wang Gungwu, China Rises Again—Part I: Unlike the past three occasions, China faces new global challenges to its preeminence, YaleGlobal, 25 March 2009.

[18]早在1989年夏,福山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发表了《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1992年由自由出版社出版。

[19]《民主在衰退,独裁者卷土重来》,德国之声网站,2010年5月27日。

[20]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21st Century), Verso, (January 5, 2009); 中文版,路爱国、黄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为,这种西方模式几乎毁灭了整个地球。它是西方先于东方,率先发动了工业革命,既制造了空前的生产力和空前的经济财富,又盲目地崇拜商品,不断地进行帝国的领土扩张,严重地破坏自然环境,掠夺式地利用和消耗有限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导致油价飙升,全球变暖,对内进行剥削和掠夺,对外发动了多次的国际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大规模地进行军备竞赛……都反映了毁灭性资本主义的属性,他怀疑这种资本主义能够继续演化下去。他以极大的兴趣关注和赞赏中国的发展模式,认为中国迟早会走上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中国可能领导世界走向一个真正尊重不同文化的文明联邦的道路。由于中国拥有广阔的土地,但因为她的人口规模却只有有限的自然资源,这也使得中国不能以在此之前的美国或其他资本主义道路为学习的榜样。

“自由市场经济加一党专制”。这是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最具主流的看法。例如英国剑桥大学斯特凡·哈尔珀最近出版了《北京共识:中国的专制模式将如何主导21世纪》,^[21]他认为,对西方资本主义,无论来自中国经济上的威胁还是来自军事上的威胁,都不是最大的威胁,恰恰是来自她的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威胁,特别是中国的“专制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大批中产阶级出现,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破坏独裁主义,而在事实上鼓励了独裁主义,让一党专制合情合理地成为社会稳定的唯一保障。这对发展中国家极有吸引力,他们的领导人渐渐不以实行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民主模式为目标,而是学习中国,先开放对外投资,允许国内私营部门发展,但是执政党控制了政府、司法部门、军事和信息,这会削弱美国为首的自由价值,包括人权、法治和言论自由等。他认为,美国和中国不是伙伴,是“政治对手”。中国模式正在夺取西方模式的优势,后者对人权和基本自由有种种要求,而中国一概忽视。他的结论是:中国让西方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小。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论”。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欧亚集团总裁)在《自由市场的终结:谁将在政府与企业战争中获胜?》一书中,将中国实行的宏观经济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视为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是自由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外的第三种模式。他把这种模式解释为由政府控制市场,公司的存在,只不过是服务于政治目的而已。他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的确在兴起,不只是中国,也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根廷等大国,或多或少都在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为此,西方跨国公司在过去几十年所拥有的全球优势地位将受到严重的挑战。^[22]他和德温·T·斯图尔特(卡内基道德准则和国际事务委员会项目主任)发表文章称中国为“全世界排名首位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者”,在这个体系中,政府利用国有企业和国有投资工具来主导市场活动。中国使国家资本主义具备了全球性意义。^[23]

由此可知,伴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经济衰落,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势必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也势必使中国模式成为国际学术界争论的热点。不过,具有西方主流意识的学者最为恐惧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将极大地吸引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从而对长期统治世界的西方主流价值观形成巨大的挑战。这是我们讨论“中国之路”的国际背景,这也需要我们对这一命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二、中国之路的命题

除了外国人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外,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来看,要提出中国之路这样的命题,包括三个问题:一是是不是真有“中国之路”这条道路?二是“中国之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历史的发展轨迹是什么?历史动因是什么?三是未来的中国之路是什么?如何继续走出这一崭新之路?

“中国之路”这个命题是由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来的。1956年,他以《论十大关系》为重要标志,首次提出

[21]Stefan Halper,The Beijing Consensus:How China's Authoritarian,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April,2010.

[22]Ian Bremmer,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Who 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s?Portfolio Hardcover;May,2010.

[23]Ian Bremmer,Devin T.Stewart,The Rise of State Capitalism,Eurasia Group,May 26,2010; Ian Bremmer,Devin T.Stewart,China's State Capitalism Poses Ethical Challenges,GlobalPost,August 10,2010.

“中国之路”这个命题，以力图突破苏联模式，总结新中国成立七年来中国自己经济发展的经验，走出自己的道路。^[24]这是毛泽东的初步探索。毛泽东还指出：“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25]这是毛泽东的经验。同年，邓小平在《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讲话中指出：“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吃过许多亏”，特别是“教条主义，就是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不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它使我国的革命遭受过失败和挫折”。^[26]事实上，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都是僵化的表现，是犯错误的根源。

最经典地提出“中国之路”的还是邓小平。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提出的，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7]邓小平这个结论很清楚：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从来都不能够成功。这句话既说明过去我们照搬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不能成功，也意味着今后中国改革开放如果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也是不成功的，而自主创新发展之路才是成功之路。这里邓小平首先继承了毛泽东延安时期实事求是这个基本原则，其次也创新地提出解放思想的基本思路，从而就形成了务实主义与创新主义相结合的改革开放路线以及方法论。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十分智慧性的思维，也是十分清楚地反映“中国之路”的基本经验。

中国之路的含义和三大要素

我对“中国之路”含义的认识反映在《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书中。^[28]我把它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这包括三个基本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和信息要素。本质上来看，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落后者，她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包括经济追赶、教育追赶、科技追赶、信息通信技术（ICT）追赶等。

第二个因素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优势。这也是毛泽东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虽然他的许多创新都没有成功，如“人民公社”、“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工农兵学员上大学”、“赤脚医生”等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连他也没有想象到这些“新生事物”也会垮掉，成为昙花一现，^[29]但是他执著地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和努力都成为历史的财富和动因。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凝聚十几亿人民，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在政治上实现国家统一强大，长治久安。

第三个因素是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安居乐业社会。我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理念概括为“八个社会、一条道路”，其目的是使所有的人才发挥作用（人尽其才）。另外重要的则是对全球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包括和平、发展、合作。

[24]1977年3月正式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一文当页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2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6]邓小平：《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56年11月17日，259～260页，《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7]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2～3页。

[28]胡鞍钢：《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9]毛泽东指出：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毛泽东：《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1959年7月2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3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三、中国之路的历史过程

从历史背景来看中国之路。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不过始终处在农业社会、农业文明、农业经济时代;1500年以后欧洲出现资本主义因素,1750年英国工业化以后,中国就落后了。世界在变,“天下”在变,但是中国并没有发生变化,因而近代的中国就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一盘散沙的国家,尤其是清王朝末期包括孙中山到蒋介石时代,没有国家能力来调动和配置全社会各种资源启动工业化和现代化。18世纪,清王朝因为长期实行自我封闭政策,而导致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尽管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比重的1/3,但是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因落后而不断被挨打;20世纪初,孙中山因挨打而奋起革命(指辛亥革命),企图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实现《建国方略》的强国之梦,但是这场革命还是失败了,中国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也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指传统农业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蒋介石也企图统一中国,还企图实现中国第二次崛起,然而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达到历史的最低点,^[30]成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人均收入比1820年水平还要低。^[31]

毛泽东不仅认识到落后必然要挨打,而且也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邓小平认识到因为封闭而落后,要改革开放,融入世界潮流,才能富民强国。

中国之路的转变过程

中国之路的转变过程其实是如何从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的世界性落伍者变成追赶者,进而转变为领先者、创新者。这个历史逻辑过程起始于毛泽东提出的“一化三改”,也就是要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32]进而,毛泽东把当时的中国国情分析概括为“一穷二白”。他指出: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不过,毛泽东并不悲观,他认为,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33]中国之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书写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之路是从世界最贫穷人口大国转变为小康社会之国。1949年时,中国还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人口大国,人均GDP比1820年还低1/4,几乎占世界绝对贫困人口人口的1/3,人类发展指数只有0.255;到2010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达到了近0.8;而到2020年就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类发展指数将达到0.88,已属于世界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人口。

中国之路是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变成现代社会,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1949年时,中国还是一个典型农村社会,城乡人口比重还是“一九开”,全国仅有城市132个,占全国总人口的7.3%;到现在,城市人口占45%,农村人口占55%。但是,今天的农村现代化因素已经很高,比如电话普及率已经达到99%,行政村的因特网连接已经超过90%,与以往传统的农村社会的概念也不一样。目前,中国城市总人口居世界首位,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2倍,正在构建世界最大的城市群及现代交通运输通讯基础设施网络。

中国之路是从一个工业化落伍国转变为世界工业大国。1949年时,中国工业产品产量与当时的先进工业国家水平相差至少100年以上的时间。我国已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到2009年,全世界大概共有500种工业产品,其中220种产品我国产量居世界第一,装备和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34]我国工业增加值

[30]根据安格斯·麦迪森计算,1949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为4.5。Angus Maddis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 August 2009, <http://www.ggdc.net/maddison/>

[31]根据安格斯·麦迪森计算,1820年,中国人均GDP为600美元,到1950年已经降至477美元。Angus Maddis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 August 2009, <http://www.ggdc.net/maddison/>

[32]毛泽东:《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315~3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4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4]《人民日报》,2010年10月9日。

占世界总量比重上升至15.6%，超过日本(为15.4%)，居美国(为19%)之后。^[35]

中国之路是由文盲充斥、愚昧落后的人口大国转变为世界人力资源强国。1949年时，中国还是文盲充斥的大国，80%人口是文盲、半文盲人口，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年，大学文化人口仅为18.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万分之三点六，科学家不足500人。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是世界人力资源大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9年，高等教育人口已经达到了9000万人，专业人才超过4200万人，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人员达到近200万人·年，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达到161万人·年，超过了美国、欧盟，大大超过了日本；到2020年还要实现人力资源强国、人才资源强国的目标，中国的人才总量有可能增长80%，由2007年的1.04亿增加到2020年的1.8亿；全国主要劳动人口受高等教育比例、从事研究职业人员都将翻一番，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大幅度提升；人力资本投资(指全社会教育、卫生、研究与开发经费)占GDP比例明显提高，人才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

从技术革命来看，中国之路就是从现代技术的落伍者、科技空白国成为世界科技大国。目前，中国高科技增加值和出口额居世界第一位，国际专利申请量已居世界第四位，国际科技论文发表数居第二位，论文引用居第八位；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创新国。^[36]

中国之路就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化者转变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推动者，从一个自我封闭、半封闭的社会转变到一个开放、全面开放的社会。

中国之路就是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具有强大政治凝聚力、组织化程度高的人民民主社会过程。

由此形成世界历史超大规模的社会转型，这就是中国之路的含义及影响。

中国之路的历史过程

从历史过程来看，中国之路的本质是现代化追赶，不同时期，领导人有不同的追赶目标和追赶战略。中国的确具有一些长期优势，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具有一些长期劣势，比如大国优势，但其实“大有大的难处”，因而很大程度上是优势和劣势并存，此消彼长，它们之间的变化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传统，如果不现代化就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障碍；一旦将它们继承并现代化，进而还要国际化，就会成为中国的软实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初始条件及其制约论。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在一个历史舞台上。

从挑战响应的角度来看，现在的领导人，都是十分强调前所未有的挑战、前所未有的机遇。

从领导人认识和信息结构来源看，领导人如何认识中国国情，如何认清世界的世情，包括对世界是不是误判，都是很重要的。

从决策机制来看，是个人决策还是集体决策。中国的决策机制已经从毛泽东个人决策转变为邓小平时代的集体决策，从封闭决策转变为开放决策，从独自内部决策到参与咨询决策。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集体决策、科学决策和参与咨询决策已经保障了过去三十年的巨大成功，同样也能保障未来三十年取得更大的成功。

另外，领导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是不一样的。毛泽东执政27年只出过两次国，还只是去苏联，无论是对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知之甚少，十分封闭。而现在的领导人一个月就出访两三个国家，参加国际性会议。如我们统计，江泽民同志(1997~2002年)出国访问46次，胡锦涛同志(2002~2007年)出国访问56次。不断开放式的学习使领导人获得全球发展知识，进而会有更多的创新能力。

中国之路其实还是要回到毛泽东的《实践论》(1937)，是不断认识—实践—再实践—再学习—再总结的过

[35]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10年国际工业发展统计报告》(2010年3月3日)。

[36]2006年2月9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目标：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与开发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

程,又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这样的学习过程,从领导人的学习到全体人民的学习,其本身也是一个互动过程。

四、中国之路的分析框架、主要观点

主要分析框架:国家发展生命周期模型

在讨论中国之路的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上,我曾在2003年提出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的一国五阶段模型。2007年,我提出国家发展生命周期“四阶段说”。^[37]

由于世界不是由一个国家组成或不是由一个国家主导或统治,而是由多个国家组成,特别是多个大国组成的竞争格局条件下,可能会像A产品和B产品的市场竞争一样,形成了A国和B国的国家竞争,那么就会存在由两个国家的发展与竞争的“四阶段说”(见图1)。这里,我们将纵坐标来表示一国经济实力或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以反映A国与B国竞争结果的相对变化。

第一阶段是A国的准备成长期,最先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如人均收入或人均GDP年增长率超过1%,经济实力或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有所提高。而B国仍未摆脱长期停滞,几乎没有出现任何现代经济增长迹象,也不对A国构成任何挑战和威胁。

第二阶段是A国进入迅速成长期,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迅速上升,同时对B国形成外部冲击和外部威胁,迫使B国发动工业化,对A国的外部冲击和威胁作出回应,在该阶段后期B国开始进入准备成长期,作为A国的追赶者。

第三阶段是A国的强盛期,成为世界性大国(World Power),它的经济实力或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达到最高峰,但是它发展速度从加速到减速。B国借助经济全球化从A国获得的各类资源(知识、技术、资本和人才),开始进入加速成长期,表现为它的经济实力或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开始上升,对A国形成竞争甚至挑战。^[38]

第四阶段是A国的国力衰落期,表现为由于内外部原因引起的国家衰退,既有来自B国进入迅速崛起期或者朝着强盛期转变的外部挑战,也有其老化过程的内部弊端或严重疾病,那么A国就不可避免地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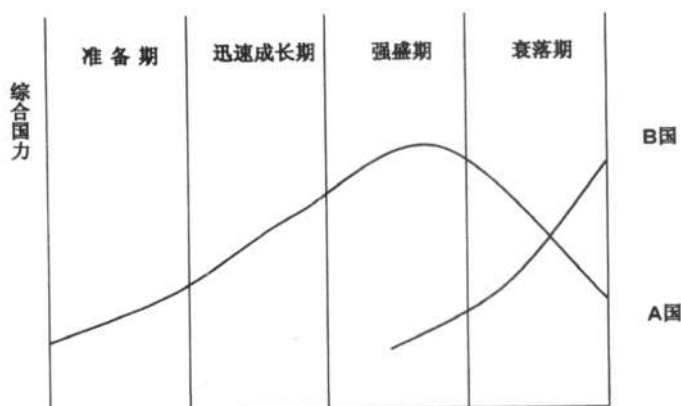


图1 四阶段国家生命周期(A国与B国)

以上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A国与B国之间的竞争,是一个十分简化的理想模式(Ideal Type),而两国竞争的现实是远为复杂和丰富的。如果存在多个大国或者有多个大国主动参与竞争时,上述国家发展生命周期

[37]胡鞍钢:《国家生命周期与中国崛起》,《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

[38]金德尔伯格介绍瑟拉的看法,新兴霸权国家在一个又一个领域不断赶超,并利用较高的效率、较低的成本或较好的设计力量,将比较衰老的霸权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Charles Kindleberger, 1996, World Economic Primacy: 1500 - 19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著:《世界经济霸权:1500 - 1990》,中文版,第6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还会形成更为复杂的局面。例如,19世纪的中国、印度没有能够参与全球竞争,是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化者,也是世界工业化的落伍者。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中印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才开始真正参与全球化竞争,世界各大国的竞争因而形成新的关系格局。

我是选取五个总量指标来定量描述在全球一体化及国力竞争环境下一国的发展生命周期的动态变化。第一,一国GDP占全世界总量比重,反映该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变化,这是该国综合国力的基础(见表1);第二,一国出口额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反映该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变化,这是该国国际竞争力的表现;第三,一国的人力资源占全世界总量比重,反映该国在世界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变化;第四,一国的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总量比重,反映了该国在世界工业化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变化;第五,一国的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见表2),反映了该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变化。这是我们自己的创新成果。^[39]我们将综合国力定义为一个国家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所具有的能力,特别是运用国家战略性资源的能力。作者的计算共包括8大类国家战略资源(指经济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自然资源、知识资源、政府资源、军事资源、国际资源)、23类量化指标。

同时,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是可以进行验证的,我采用了安格斯·麦迪森世界人口、GDP和人均GDP数据库,下表既可以验证西方国家和日本、苏联(俄罗斯)的生命周期变化,也可以看出中国农业社会时代、农业社会向工业时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基本情况,说明中国是先衰落、后崛起的历史轨迹,印度也是同样的轨迹,这都不同于西方国家。

表1 七大国GDP占世界比重变化(1820~2030年)

国家	1820	1870	1913	1929	1950	1973	2008	2030
英国(%)	5.21	9.00	8.22	6.76	6.53	4.22	2.84	
德国(%)	3.86	6.48	8.69	7.06	4.98	5.90	3.36	
美国(%)	1.80	8.84	18.94	22.70	27.32	22.07	18.61	17.3
俄国/苏联(%)	5.42	7.52	8.50	6.42	9.57	9.44	2.51	3.4
中国(%)	32.88	17.05	8.83	7.37	4.50	4.62	17.48	23.1
日本(%)	2.98	2.28	2.62	3.45	3.02	7.76	5.70	3.6
印度(%)	16.02	12.12	7.48	6.52	4.17	3.09	6.70	10.4
美国/中国(倍)	0.05	0.73	2.14	3.08	6.07	4.78	1.06	0.75

注: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http://www.ggdc.net/maddison/\(02-2010\)](http://www.ggdc.net/maddison/(02-2010));

2030年数据引自Angus Maddison, 2007,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 OECD.

表2 五大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1975~2008年)

国家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08
中国(%)	3.60*	3.81*	4.82*	5.97	7.76	8.71	11.51	13.14
印度(%)	1.89	1.99	2.51	2.89	3.37	3.72	4.36	4.61
日本(%)	4.36	4.58	11.62	9.87	9.54	8.99	8.17	8.51
俄罗斯(%)					3.00	2.85	3.02	3.24
美国(%)	12.24	12.73	18.49	24.51	23.14	22.19	21.41	19.69
美国/中国(倍)				4.10	2.98	2.55	1.86	1.50

影响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我认为,一个国家兴盛或衰落绝非是偶然的。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一个国家能否创新,而不僵化,不停滞;能否持续的创新,而不中断,不夭折;能否比它的竞争国家更具创新力,而不骄傲,不落伍。一个国家衰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创新,压抑创新。这必将在面临冲突和

[39]胡鞍钢、门洪华:《中美日俄印综合国力的国际比较》,载胡鞍钢主编:《中国大战略》,41~79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竞争的过程中走向衰退。**不断创新是一个国家迅速发展、迅速崛起、迅速强大的根本动因。**中国的兴衰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么,中国之路最大的创新是什么呢?就是创新了一个符合国情的、能够顺应世界潮流的、能够主动应对国内外挑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集体创新,也是党中央的集体创新,特别是几代党中央领导人的不断创新,也包括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败的过程。

从1949年建国以后,大概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9~1977年,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初步成长期。在这个阶段,主要是模仿创新、封闭创新,既有创新成功,如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1949~1957年),又有创新失败,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虽然创新失败,但是毛泽东仍然具有极大的创新精神。

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国家生命周期的第二阶段:经济起飞与迅速崛起期。这个阶段的创新是开放创新。先是引进创新,大规模的技术引进、理念引进;然后是加速创新,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再是自主创新、全面创新、大规模创新:这些创新构成了中国崛起。

三个核心观点:中国之路创新论、中国机遇论、中国贡献论

针对国外的观点如“中国威胁论”等,我自己逐渐形成三个核心观点。**第一是中国之路创新论。**这是中国最大的创新,不只是技术创新,实际上是一种理念创新,也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八个字,后经江泽民、胡锦涛又成为十六个字,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也是一种制度创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充分结合并利用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两种优势;更是一种市场创新,中国最大的潜力是十几亿人口的人均收入增长,最大的优势是巨国市场,有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就会激发更大规模的市场创新,最终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最后才是技术创新,中国要成为世界创新型国家、R&D中心。

第二是中国机遇论。1995年,我在新加坡大学讲学时提出“机遇与挑战并存论”;^[40]2003年,我又提出“机遇大于挑战论”;2007年,在《2020年中国》这本书中进一步提出“天时地利人和说”,^[41]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进一步论证和支撑“中国机遇论”。

第三是中国贡献论。在1995年时,我提出四大贡献:增长贡献、贸易贡献、减贫贡献、发展经验贡献,尤其是发展经验的贡献。^[42]从未来来看,中国还要作出三大新贡献:绿色贡献、知识贡献、文化贡献。^[43]

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表3显示中国经济增量对全球经济增量的贡献一直处于较快速度增长状态。以PPP计算,2008~2020年期间,中国的贡献率能占到1/3的比例;以不变价格的汇率法计算,这一贡献率也占到近20%。但实际上2009年按照汇率法计算,中国对全球新增GDP贡献率已经达到50%,这是联合国的一个研究。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贡献率还会更高。所以,这张表明确显示了中国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只不过很多人在心里尚未准备好。

表3 中国GDP增量对世界增量的贡献(1980~2020年)

时期	2000年国际美元(PPP)(%)	2000年美元价格(汇率法)(%)
1980~1990	11.5	4.1
1990~2000	26.1	9.7
2000~2008	32.12	16.9
2008~2020	> 1/3	19.6

注:表中数据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

数据来源:PPP数据来自 Angus Maddis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 2010. 汇率法数据来自

[40]胡鞍钢:《中国:经济起飞、大国兴起及其影响》,载《胡鞍钢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41]胡鞍钢:《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42]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21世纪的十大关系》,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43]胡鞍钢:《60年经济发展让中国走向世界强国》,《经济参考报》,2009年9月30日;胡鞍钢:《中国第三代现代化的绿色想象》,《绿叶》杂志,2010年第1期。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6, CD-ROM;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7; 以及 World Bank 数据网站 <http://data.worldbank.org>. 2008 ~ 2020 年数据系作者估计。

从对全球的贸易贡献来看,中国也是愈来愈大(见表4)。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09年,中国的出口贸易已经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一,两国分别占世界总量比重的9.6%和9.0%;中国进口贸易额超过德国,居美国之后,两国分别占世界总量比重的12.7%和8.7%。2007年,我研究到2020年中国的进口可能不会超过美国;现在看来,可能不用到2020年甚至到2015年,如果中国进一步降低关税,实行更彻底的贸易自由主义,就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市场。

表4 中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1978~2006年)

	1978 ~ 1993	1993 ~ 2006	1978 ~ 2006
出口贸易额增长率(%)			
中国	8.23	18.70	12.96
德国	4.51	7.83	6.04
美国	6.14	5.50	5.85
世界	4.93	7.28	6.02
对全球出口贸易增长贡献率(%)			
中国	3.11	12.76	10.29
德国	7.30	8.65	8.30
美国	16.13	9.46	11.17
世界	100	100	100

注:出口贸易额按1995年美元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数据库(WDI 2009)数据计算。

中国最大的贡献还是对全球减贫贡献。1981~2005年期间,世界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减少了6.56亿人,其中中国与印度分别减少了6.24亿人和2960万人,对全球的减贫贡献率分别为95.1%和4.5%,合计99.6%,中国成为世界减少绝对贫困人口贡献最大的国家。2004年,在世界银行和中国财政部于上海召开的全球减贫高峰会议上,我提供了一份很重要的有关中国减贫和国际援助的调研报告。报告指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对中国的减贫确实作出很大贡献,但是国际援助并不是决定性的,一个国家内部改革和发展政策才是决定性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越是改革开放,越是有效的发展政策,国际援助所取得的效果就越好。2000年,联合国明确提出“千年发展目标”(MDGs),其核心目标是到2015年全球贫困人口比例要比1990年减少一半。实际上,中国是2000年提前15年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减贫是过去30年中国对人类发展最大的一个贡献。

中国发展经验的示范作用

中国发展经验的示范作用包含种子作用、示范作用、催化作用。中国有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验与发展减贫经验,现在应该认真总结自己的宝贵经验并与发展中国家分享。三年前,我受越南社科院的邀请,就中国如何加入WTO、应对WTO在越南南北方各讲一场,除了学者之外,还有不少省级干部。当时,越南刚刚加入WTO,他们渴望了解中国是如何应对开放市场的挑战,如何进行内部的调整。这些方面的国际交流都有助于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解。



顾全大局 无私奉献-李凤军